

# 《西行漫记》封面号手是谁

《西行漫记》一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力作。该书的封面是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迎着朝阳，吹响着前进的号角。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虽然在众多场合经常能看到这幅照片，不少曾被斯诺摄入镜头的老红军也先后著文，讲述那些照片拍摄的经过，但这照片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情况下拍摄的，照片中的人物是谁，他与《西行漫记》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却鲜为人知。

## 吹响“抗战之声”的红军号手

一面迎风飘扬、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间透着英武、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气魄。这就是《西行漫记》一书中“抗战之声”一图的小号手。

1972年2月，斯诺病逝。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深切悼念之情，《人民画报》当年第五期用了4个整版登载了毛泽东的唁电，同时刊发了斯诺在1936年时拍摄的部分照片，这张“抗战之声”的图片亦在其中。

当时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谢立全将军看到了《人民画报》后，提笔给妻子苏凝（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便把我拉过去照了相。”由此，谢立全第一次道出了斯诺镜头中“红军号手”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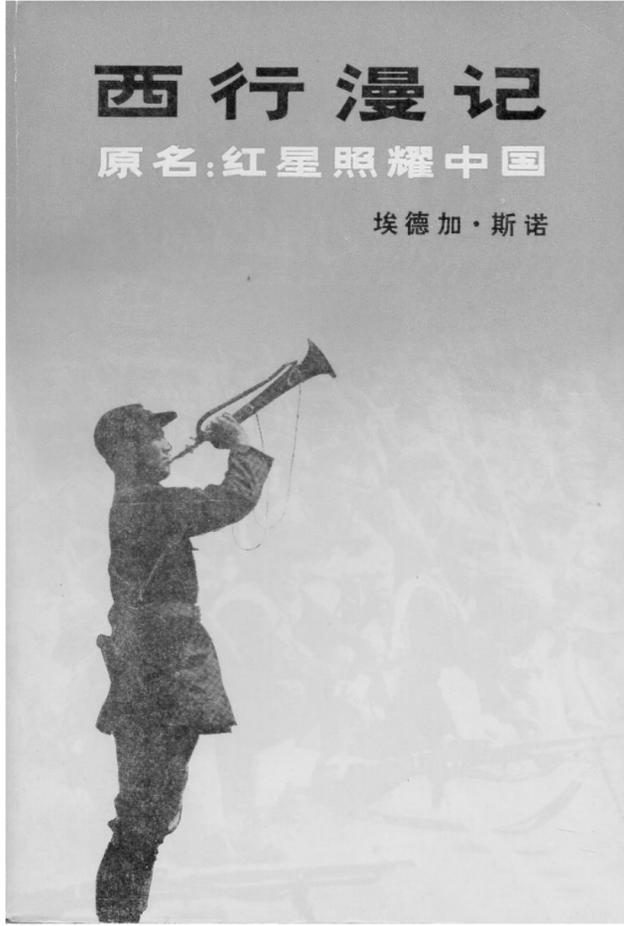
当年，《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谢立全并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时从一些战友的口中得知了这幅早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照片。但他从没有刻意地外去寻找，更没有对别人提起过。一直到了上世纪末，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摄制组在重走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发现了谢立全写给妻子的这封信的影印件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谢立全将军之子、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谢小林大校。谢小林才拿出了父亲在1972年5月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平静而深情地述说了这段尘封了整整60年的往事，从而揭开了“抗战之声”照片中红军“号手”的谜底。

## 毛泽东称《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深深地打动了美国记者斯诺。于是，他带着当时无法理解也并不太了解的一系列问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936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女士并表达了访问陕北苏区的愿望。这样，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京到郑州与美国青年医生海德姆会合，再由西安的红军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乘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大道奇卡车，藏在军用棉衣下面到达了延安。随后，他们从安塞县进入苏区，到达了白家坪红军东线前沿指挥所。迎接斯诺和海德姆的是一位清瘦的，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的中年军官，他走到斯诺面前，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里的指挥官，我叫周恩来。”这让斯诺大吃一惊，这位红军指挥官就是被蒋介石悬赏八万块银圆缉捕的周恩来！斯诺在后来回忆时说：“他那憨厚、坦诚的微笑很动人，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海德姆，同他们长谈了两天，亲自为他们拟定了一个92天的苏区旅行计划，还在用手绘制的地图上，为斯诺注明了去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姓名。斯诺于1936年7月下旬前往宁夏、甘肃访问西征的红军。于9月底回到保安，同毛泽东接触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成长历程及西征战役……还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西行漫记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笔记和30卷胶卷回到北平。随后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其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接着在美国翻印。不久，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间闻名遐迩。

1938年2月，该书中文译本在上海问世，鉴于当时的形势，易名为《西行漫记》。中译本与原著的不同之处是增加了原著出版时不便发表的大量照片。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版的《西行漫记》中，“抗战之声”被用作中译本的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那位英姿勃发的“号手”成为一段历史和—个时代的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苏区时，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誉道：《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从而也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与支持，同时也鼓舞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斗志。

## 谢立全的英姿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研究部署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到宁夏、甘肃，以扩大新根据地，扩充红军，促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抗战。经过半年的征战，解放了陕甘宁地区近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来到了红军西征总部驻地——宁夏的豫旺堡采访红军指战员。斯诺在采访中对红军小号手特别的关注，他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但他并没有提到《西行漫记》封面照片中的“红军小号手”是谁。而在《西行漫记》的“红小鬼”一节他又这样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了，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续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糊模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儿也不是褪色的，红通通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就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小宝贝，而已经是一

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4年前已在南方参加了红军。”不过这位“号手”究竟是谁，斯诺的笔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那么，《西行漫记》封面照片的那位红军小号手到底是谁呢？谢立全之子谢小林大校在介绍这张照片时说：“其实，我父亲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是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

那么为什么要让谢立全这个“非号手”摆个姿势呢？原来，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到达陕北后，各种物资依旧很匮乏，红军指战员破旧的着装也不能得到更换。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兵突然袭击了红军后勤部门，红军官兵奋起反击，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部队追击，不仅夺回了全部被掠物资，还缴获国民党军队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此，上级奖励给了谢立全一套合身的全新军装。

拍照那天，谢立全正好刚穿上这身新军装，恰好被斯诺看见了，他便马上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招呼过来，拉到了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在军旗下拍摄了那幅“抗战之声”的照片，将中国“红军号手”的英姿定格在了那永恒的瞬间。

所以，斯诺镜头中这个面孔透出果敢的“红军号手”，就成了时年19岁的谢立全。这个秘密被谢立全悉心珍藏了36年，又被他的家人埋藏了整整24年……

谢立全吹号的英姿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这种情结，斯诺便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彩色封面上，使用了谢立全吹号的照片，并把这幅完整的照片取名为“抗战之声”。

谢立全是江西兴国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立全将军戎马的一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生，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情怀。在他给妻子苏凝的那封信的末尾说道：“此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妻子苏凝尊重了他的愿望，也把这个秘密埋在了心底。

1973年，谢将军不幸患了癌症。此时，他觉得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了。于是，他请有关同志与存放底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联系，洗了几张照片，分别赠给5个子女作为永久的纪念。该年10月，谢将军在北京逝世，家人也将这张照片嵌于其骨灰盒上，永远陪伴着将军的英灵。

将军逝世后，按说，可以让世人知道这段珍贵的史实了。将军的一些老战友也希望他夫人苏凝能够就此写一点回忆性的文章，以寄托他们对将军的怀念。但深知丈夫品性的苏凝始终尊重丈夫的意愿，从未动笔，这一段珍贵的历史依然被小心翼翼地埋藏着。

一直到上世纪末，这张著名照片的故事终于被揭秘，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为谢立全将军的高风亮节而深深感动。他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高尚情操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缅怀去追忆。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据《文史精华》）

## 五四运动对银川的影响(上)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还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些新思想、新思潮涌入银川，给地处西北内陆、信息闭塞的银川带来了新气象，为党组织在银川的建立作了动员准备，也为银川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 改良风气 为新思想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落后的清王朝，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外商受惠于各类不平等条约，在宁夏设立了一些洋行，开展以收购羊皮毛为主，包括收购甘草、贩卖食盐在内的各类商业活动。当时的宁夏有林仁、仁记、新泰兴、天长仁等10家洋行，这些洋行与官府勾结，以低价获取皮毛等物资，逃避厘税，赚取高额利润，对本地民族商业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在文化方面，帝国主义通过传教活动，在银川等地陆续建立教堂，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宣传和渗透。一些传教士横行乡里、为霸一方，引发教案。当局在处理相关事宜后，为了献媚洋人，大肆搜捕，滥杀无辜，引起百姓强烈不满。如发生在平罗的下营子教案，腐朽落后的统治者不仅抓捕杀害30余名无辜百姓用以“谢罪”，还将阿拉善几百顷土地作为抵押，赔偿下营子教堂42000两白银。

最早将五四运动消息带入宁夏的是当时的一些旅京青年学生。这些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心系家乡，通过书信、邮寄、自带等多种方式及时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七日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传入宁夏，向家乡人民传递了这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伟大革命运动的消息。1919年7月，一些旅京、津的学生及进步人士利用暑期在银川举办演讲会、报告会，进一步宣传了五四运动的盛况，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军阀卖国行为。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银川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各种进步书刊也迅速传入银川。1920年3月，以五四运动中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陇》杂志社在北京成立，并在银川等地设立代办处，负责通联和发行工作。同年，位于银川的五中八师开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并邀请一批具有开明思想、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员任教，向学生灌输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随着“学科学、讲民主”理念的进一步宣扬，社会风气得到改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包括部分接受新思想群众在内的先进分子开始觉醒，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传播，这为推动银川地区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准备了条件。

（据银川党史网）

## 明代园林(中)

永春园。位于今宁夏人民会堂偏东，为安塞、巩昌郡王府花园。园内有湖，湖中有岛，岛上有假山、草庐。园中还建有延宾轩一所，曾是庆宗有名的才子王侑朱熹灵墓、问学和会友吟对的地方。

后乐园。为都察院行台花园。园中引渠水环流，有亭名“环碧”，林木葱翠，花坞之旁又有射圃，使该园集观赏与游戏于一体，难怪都宪大人常逍遥徜徉，或“焚香理琴”，或徘徊于林塘花鸟之间。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宁夏巡防王时中赋《趣后乐园》，摘录其中四句如下：

东耕西牧满山川，门馆风清昼欲眠。坐有方亭畦有田，曲渠导水绕阶前。斜薰桥畔听潺潺，花馨琴韵隔鱼渊。鹿吻鹤舞蝶翩翩，槐柳柳影拂晴娟。

西园。为帅府后园，被称为城镇中的“小蓬莱”，此园以牡丹闻名边塞。都御史总兵官张勋作《赏镇守西园牡丹》诗云：

拥出雕阑二尺饶，娇红嫩白照金袍。薰风细细香偏别，仙苑沉沉价自高。老岁岂堪逢异品，群芳应是避豪豪。游观会得花神意，只许高轩驻节旄。

梅所。谪戍宁夏的湖南黔阳县原县令郭原将内地的梅花移植成功，所以给修建的小花园取名“梅所”。园林景色十分秀丽，引得不少文人故友写诗称赞。当时的塞上诗坛著名诗人潘元凯的《梅所》诗说得明白。诗云：

黔阳旧令何清楚，芳苑新题字梅所。塞北江南几千里，春色移来梅所里。明代流寓诗人承广也赋诗道：客以梅为所，移梅取次栽。花枝向南发，山色自西来。清影孤窗月，黄昏一酒杯。扬州何逊迹，东阁待谁开。

另外，城内的郡王府园还有真宁王府（今银川市中山北街东侧）的赏芳园、弘农王府（今宁夏人民会堂偏北）的寓乐园、丰林王府（今宁夏日报社南侧）的真乐园加上后起的寿阳、华阴、镇原三王府的花园，与庆王府的逸乐园以及巩昌王府的永春园，共同构成了八大王府花园。

（据《历史银川》）

# 一个流落阿联酋的中宁籍志愿军战士——侯保连(上)

杨应林

中宁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流落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侯保连（原名侯保立）。

1933年春，侯保连出生在中宁县关帝庙乡史家营子村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被父亲雇给大地主魏余三当小伙计放驴，干了7年，已是14岁的人了，掌柜的再不能容忍他放驴，而是让他跟毛庄头下地干活，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稍有差错，便遭庄头打骂，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了家。家中没他尚且吃了上顿没下顿，再添一口无疑雪上加霜。适逢渠口保小地主郭生兰家缺乏劳力，有个13岁的女儿改改，欲招长工女婿人赘，唯一条件是5年后才能成婚。父亲侯生才闻讯，立即前往与之说和，让儿子去应聘。侯保连思谋着，5年后，自己已是19岁的人了，届时整个不要钱的老婆，岂非一大快事，何乐而不为，便高高兴兴地招亲去了。俗称“女婿是半个儿子”，郭家人好，待他如亲儿子一般吃穿住不分彼此，虽说没有工钱，到了年头节下，免不了给几个零钱花，改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左一声右一声“哥哥”，把侯保连叫得没了魂，侯保连

自然心情愉快精神焕发，里里外外的活都拼命去干，而且干得很出色，深得岳父母的好感，一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融洽。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因侯家有两个男孩，按马鸿逵二丁抽一的征兵规定，侯保连被抓了兵，这下给两家带来了最大的不幸，临别之日，老小垂泪话别，尤其是改改，难舍难分之情溢于言表。侯保连被分配在马鸿逵保安第2纵队新兵团一营学号兵，住在灵武县。1949年9月下旬宁夏解放时，该部起义，侯保连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4军192师576团2营4连当战士，经部队通知地方政府，侯家按军属优待。

1950年下半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战火迅速延及我国东北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国政府果断作出决定，派志愿军出国参战，侯保连即在军中。从此，他没有给家里来过一封信，音讯全无。1953年暮秋，192师政治部给中宁县政府寄来一份烈士证明书，证明侯保连同志于8月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于是，县民政科会同烈士家属所在地的五区政府和该区六乡（关帝乡）政府，携

带烈士家属牌匾、抚恤金和礼品，敲锣打鼓把烈士证明书送到侯家，并按规定给予烈属优待。侯保连同志牺牲，《中宁县志》烈士名单存载。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不觉到了30多年后的1985年，宁夏区建三公司承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些楼建工程，工程位于该国首都阿布扎比机场东约12公里的夏哈曼，合同期为5年，至1989年竣工验收。中宁枣园人陆金荣，是工程建筑队的领导人之一。就在1989年7月工程接近收尾时，陆金荣每日必到各工段现场去检查指导工作。21日中午在收料处，一位穿着八字胡的彪形大汉，驾驶一辆大卡车来送料，收料员周万珍（中宁枣园人）欲找翻译时，大汉说他会讲中国汉语，不必去找了，于是周万珍在其他工人的配合下，迅速办妥了交货手续。这一幕在场的陆金荣看得清清楚楚，甚觉奇怪，心想在这远隔万里的西亚国家，怎么会有人讲汉语呢？便贸然把刚欲驾车返回的大汉很有礼貌地叫住，与他交谈，说来说去才知道，原来大汉就是侯保连，并且和陆金荣是姨

兄兄弟。陆金荣又惊又喜，“不是说你已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吗？原来还活着，今天又见了面，真是天大的奇事喜事。”二人情不自禁地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同时不免把一串串热泪洒在了对方的衣襟上。在场的人也觉得奇怪互相窃窃私语：“天赐良机，有缘有缘。”为了详谈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侯保连便开车把陆金荣拉到一个僻静处，没完没了地谈了起来，当侯保连问及家庭情况时，陆金荣尽自己所知，详细地介绍了有关人员的情况及家乡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经济社会的繁荣。

侯保连听后显得很满足，可陆金荣最关心的是侯保连流落的经过和现状，侯保连以复杂的心情作了简单回答。

（杨应林，男，汉族，1931年6月出生，宁夏中宁县人，毕业于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先后在中宁县第五区、民政科工作；1958年后长期从事司法（律师）工作，1989年退休后一直潜心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挖掘整理工作。2016年3月病逝。）

（据《中宁文史资料》）